



热血丹心沃中华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是因为其创作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凝结着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意志和抗战决心。

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以自己独特的精神著称于世。习主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质的飞跃。

激发中华儿女团结御侮的民族力量

民族觉醒，是战胜一切黑暗的首要条件。1840年后的近百年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一败再败，原因不全在于“国贫”，还在于“失魂”。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近代“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变成“有血有肉的活中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逼到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唤起了全民族的爱国意识。

抗日战争期间，爱国情怀突破了以往“忠君报国”的思想局限，注入了近代以来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准则、以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为目标的时代思想精华，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质的飞跃。

1935年9月17日，南开大学新学年“始业式”上，老校长张伯苓发出“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在神州陆沉、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之际的时代拷问。

“爱国三问”，中华民族在回答——这是秉持民族大义的共产党人的誓词：“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这是退无可退的国民政府的宣告：“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是华北平原一户人家的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抗战到底”。

这是一位归国华侨给父母留下的告别书：“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近代反侵略斗争史告诉我们，光有爱国主义精神还不足以打败外敌入侵，只有以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才能战胜敌人、赢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契机，以秉持民族大义的政策和行动、战略和实践，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激发出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陕甘宁边区军民身上“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成为中国人民坚强意志的代表、民族力量的象征、时代精神的符号、爱国热情的标杆。

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喷发一样迸发出来。仅川军就有40余万人先后奔赴抗战前线，其中26万余人埋骨他乡；胶东地区妇女3个月内捐献黄金50两、白银1.24万两；仅在全民族抗战的头3年，海外侨胞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工、农、商、学、兵和海内外华夏儿女齐动员，汇成抗击日寇的滚滚洪流。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20世纪30至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那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程度如此广泛，群众发动规模如此浩大，战斗意志如此顽强，抗争时间如此绵长。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淬炼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民族精魂

1938年抗战期间，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武汉街头用照片记录了历史瞬间，民众纷纷举起旗帜，其中一面旗帜上醒目地写着两个字：“不死！”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1895年吞并台湾、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4

年蹂躏东北、1914年攻占胶州湾、1931年侵占东北……中国深陷亡国灭种境地，只有中国人自己能拯救自己。抗战从本质上说，乃是生存意志的较量，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苏醒，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决战。

翻开抗战这本沉重的史书，重新阅读其中的细节，中国人民面对滴血的屠刀和发烫的枪炮，面对凶残的侵略者，表现出的坚定与从容、刚烈与无畏，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

——“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呐喊。

抗战时期，“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在那场血与火的淬炼中，在那个生与死的战场上，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充分证明“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这种浩然气概、不屈节操，激励着中华儿女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血肉之躯筑长城”的民族抗争。

“台儿庄便是我师官兵的坟墓，虽剩一兵一卒，也要坚守阵地！”在台儿庄前线，人们看到的是来自不同省籍、操着不同口音、身着不同服装的军人，他们中有川军、西北军、东北军、桂军、滇军等，一举击溃日军两个精锐师团主力。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从长沙保卫战到衡阳保卫战，侵略者每进犯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晋察冀、冀鲁豫、湘鄂赣、鄂豫皖等一个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时，几乎“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日本”。日军哀叹，“对付中共军队，犹如切割根深蒂固的野草，费尽心力而又毫无成效，真正是无能为力”“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法国作家古列久在评述中国敌后斗争时感叹说：“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

——“前仆后继赴国难”的民族牺牲。

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利。1937年9月19日，《大公报》刊发的文章《感谢卫国军人》中这样写道：“今天的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中华民族子孙孙万代的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能达到。”1941年，海明威来到中国，看到10万农民唱着号子建造机场的壮观场景不禁感叹，中国人民有勤劳勇敢、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正是一次次的不屈的抗争，唤醒了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打败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这是牺牲的辩证法、抗战胜利的丰碑。

谱写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民族史诗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雄气概、英雄事迹和英雄精神，是一个国家高度体现民族力量的内生源泉。习主席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和英雄辈出的民族。不管何种优秀品格，在英雄模范身上归结到一点，就是蕴含于英雄精神之中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论是直接参战，还是后方支援，所有投身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

——有谁这样视死如归？

是什么力量能让一个人甘愿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诗人艾青曾感慨，我们的祖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保卫土地，从不曾屈辱过一次”。在中华民族陷入“最危险的时候”，以树皮棉花果腹的杨靖宇面对敌人的劝降，凛然回答“不必多说，开枪吧”；受尽折磨的赵一曼，临刑前高唱“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誓死报国的佟麟阁，面对日寇进犯慷慨陈词“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有谁这样血战到底？

胜利背后，是惨烈的牺牲。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没有命令，死也不退”，新四军“刘老庄连”82名官兵血战到底、全部壮烈殉国，“狼牙山五壮士”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纵身跳崖……在侵略者的杀数面前，多少人前仆后继、血洒沙场，多少人沥血孤营、

横刀敌阵，多少人毁家纾难、以身殉国。“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长达14年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

——有谁这样英勇无畏？

日本每日新闻社战地记者报道，1942年5月，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一部在河北衡水徐家庄村反“扫荡”中，“坚决抵抗直到全部战死”，就连敌人都“感动于其勇气”，以其为“军人榜样”。还有手持大刀的第29军官兵，在长城抗战中手刃日军，杀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当时的日本报纸哀叹，这是日军“60年来未有之侮辱”。

抗战的胜利，不仅是河山光复，更是人心唤醒、精神重塑；抗战的历史，不仅是战争史，更是精神史。在英勇壮烈的东方主战场，抗战英雄突破了旧式英雄主义强调个人价值与作用的局限，形成了“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的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的英雄观，标识出民族精神的“天际线”。正是因为他们胸怀对祖国深厚的感情，才能把自身的爱国情、报国志融入到抗日战争之中，转化为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从而一扫近百年来屡战屡败的悲观阴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

彰显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信

胜战之道，心胜为上。人类战争史表明，战争的胜负不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战争性质等诸多条件，同时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意志和精神，以及战争指导能动性的优劣。

——心胜，源于坚韧的民族意志。

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是落后的农业国同强大的工业国之间的较量。“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1938年5月，陕北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同志拨开“亡国论”“速胜论”的迷雾，预见了抗战胜利的光明未来。

与西方战场反击法西斯相比，中国抗战之曲折、漫长、艰苦，超乎常人的想象，但这丝毫没有挫败中国人民对胜利的渴望和自信。一位军事理论家说：“敌人可侵占我城市，可屈服我政府，但决不能屈服一国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个民族的意志。”抗战时期，无论条件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无数爱国者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斗志，抱定血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在强敌面前不畏惧，不退缩，拼死搏杀。

——心胜，源于崇高的民族大义。

面对日本对中国的政治诱降，面对英美对日本的绥靖政策，面对国民党动摇妥协、出现反共分裂的逆流，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推动形成全民族不畏强暴、抗战到底的历史洪流。

当民族大义、崇高道义占据精神高地，成为一个民族的执着坚守，灵魂深处就会生成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这是中华儿女取得抗战胜利的意志保证。1937年9月18日，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给叔父的家信中写道：“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侵略愈深斗争就愈坚，压迫愈重反抗就愈烈。这是所有的侵略者、压迫者都不能逃脱的历史铁律。

——心胜，源于强大的民族信心。

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两个国家精神的较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饱经磨难，但却从未屈服，而是愈挫愈奋，从来都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把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畸形结合，将国家推入战争深渊。与之相反，中国人民从不好战，但是也从不缺乏血性和骨气。战局时好时坏，阵地时得时失，战斗往来拉锯，无论怎样艰苦卓绝，中华儿女始终保持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用民族精神凝聚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历尽沧桑而不倒、屡遭劫难而不灭的根本原因。

抗战的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的声音仍在我们耳畔回响。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召唤着坚忍不拔的中国人民。唯有保持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才能在中华大地激发出实现民族复兴的雄伟大力，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郭征同志带领部队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英雄壮举，彰显了对理想信念的赤胆忠诚、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和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激励着我们将他的革命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勇毅前行的实际行动。”近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吸引近百名干部群众参与，讲到郭征烈士的事迹时，现场的人纷纷为之动容。

郭征，原名郭辉勉，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泰和县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风起云涌。郭征父亲郭尚球曾任沙市区大冈乡中共支部书记。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郭征加入儿童团，参加革命活动。

1930年7月，16岁的郭征到赣西南红军干部学校学习。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郭征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完成任务积极坚决，遵义会议后，任九军团司令部侦察通信科科长。

1937年1月，郭征进入大学学习。同年8月毕业后，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侦察科科长，随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9年2月，郭征等7名干部奉令到冀中地方武装高士一的五路军参加改编。临行前，他说：“伙计们，我们都是长征过来的，这次组织上派我到五路军去改编，又要进行新长征了，要前进，我就干脆改名为郭征吧。”

站在一旁的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听后高兴地说：“好！有勇气，我赞成。”

1939年4月23日，日军炮击河北省河间县齐会村后发起进攻，八路军第七一六团第三营被包围在村内。齐会战斗中，任一二〇师独立一旅参谋长的郭征和旅首长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取得歼灭日军700余人的重大胜利。战后，贺龙师长对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要给郭征这个江西伢子记功。”

1939年9月25日上午，河北行唐县陈庄前线硝烟弥漫。驻守在正定、无极、行唐和灵寿等地的1500余名日伪军，企图打开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通路。面对日军“牛刀子战术”，郭征协助旅首长巧妙设伏于冯沟里。战斗最焦灼时，郭征指挥的二团如磐石般顶住日军多次疯狂冲击，为全歼敌军赢得宝贵时间。

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歼敌1200余人，只剩下残敌占据的最后一个高地。29日黄昏，我军向敌人发起了总攻，激战中，郭征胸部和头部中弹负伤，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5岁。为了纪念在陈庄战斗中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旅部在驻地召开追悼大会，郭征的遗体安葬在河北省行唐县秦台村。

虽然郭征仅仅走过25年短暂的生命历程，却在烽火弥漫的抗日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自己的人生篇章。1985年，郭征烈士魂归故里，他的骨灰迁回家乡，安葬于江西省泰和县冠朝乡（今冠朝镇）大冈村的苍松翠柏之下。

2024年6月，大冈村启动了4条道路的修建工程，老百姓践行郭征的闯劲、韧劲精神，齐心协力克服困难，4个月后，崭新的水泥路全部顺利贯通，为村庄铺就了致富的坦途。

今年清明，村民郭昌松前往郭征烈士墓前，清扫灰尘，擦拭碑石。他凝视着墓碑，缓缓说道：“这方石碑守着的不仅是烈士忠骨，更是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

人民日报



郭征

解放军报